

1949 — 本世纪末
中日关系的演化
与发展前景

主 编 邱 秀 华

辽宁大学出版社



医药学院610 2 01053614

张发荣

1949——本世纪末

中日关系的演化与发展前景

主 编 邱秀华

副主编 杨大伟 张相荣

主 审 彭定安 王国钧



ISBN 7-305-04411-2 定价 6.80元 728 页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 沈阳 110012

责任编辑：张发荣
封面设计：张发荣
校对：张发荣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49~本世纪末中日关系的演化与发展前景/邱秀华主编.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 1

ISBN 7-5610-3434-2

I. 19… II. 邱… III. 中日关系-研究-1994~ IV.
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6096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地方国营新民印刷总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40 千字 印张: 10.75

印数: 1—1500 册 插页: 1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黄永恒

责任校对: 陈 鸿 佟 新

封面设计: 刘桂湘

版式设计: 马 龙

定价: 15.90 元

序

中日两国，作为亚洲两个重要的国家，又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其睦邻友好关系之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中国既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世界性发展中的奔向现代化的大国，而日本既是当今世界经济大国之前列中的佼佼者，又是亚洲唯一实现了现代化的非传统国家。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中，东亚已是公认的“火车头”，在未来的新世纪发展中，这里更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坚。在最近三年连续召开的“21世纪与东亚经济”这一大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多次听到有关学者提出加强东亚体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提高区域合作水平的呼吁。以上所述种种，我以为都是在论证加强中日友好合作这一主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上，我为这本应属现代史专著的书的出版而高兴，并认为这是一本适应时需之书。

记得我在有意关心一下学院的科研工作并愿为之略尽微薄之力时，得知有由王国钧教授牵头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日关系之发展这一课题之议，便欣然愿为他们的这一计划奔走出力。以后，邱秀华副教授又将研究课题的开题报告和撰写大纲交我过目，我还了解到他们过去曾出版过有关中美关系的著作，从这些材料中，我确信这一科研计划实现的充分条件已经具备。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中，在王国钧教授的指导下，在

邱秀华副教授的具体组织下，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的全体教师分工合作，收集资料，奋力撰写，不仅完成了繁重的教学任务，而且完成了这本专著。这对我来说，于公于私，都是很高兴，而又要向他们表示敬意和祝贺的。

这本专著体现的题材是近40多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它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来说，据我的孤陋见闻，这即使不算是首次，也是少数此类著作中的一本。它全面地梳理了有关资料，并加以排比研究，理出了一个发展线索、分出了发展阶段，提出了一些规律性现象，特别是系统地阐释了我国对日外交的重要方针政策。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既有政府间的正式交往，又有民间的友好交流，既有官方的由对立到和解、由疏远到友好与发展，又有民间——半官方的不断推动前者发展的事实。在整体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中，也突出了中日双方重要领导人、关键性人物的活动和面貌，尤其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有关篇章，读来令人动容而引发深思。

这虽然是一部限于叙述中日现代外交史的专著，但由于本文开始所述及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它就不仅仅是大专学校分类课程的教学用书，而且可为涉及更广泛内容的研究者的参考书，同时，还可以作为部队干部和战士以及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了解形势、提高素质的一般读物，而拥有更广大的读者。

在这本书的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有关官员的关心与支持，特别是总领事大和滋雄先生的热情支持；得到了辽宁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热情关怀与支持。这都是值得表示深深的谢意的。

1996年5月25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本书的研究对象	1
二、1949 年以来中日关系演化的基本线索	4
三、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关系演化的意义	16
四、研究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格局	17
第一章 中日“民间外交”	19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后,中日“民间外交”的开始	19
第二节 中日间友好交往的扩大及民间贸易的发展	53
第三节 中日民间交往的曲折	66
第二章 中日“半官半民”的交往	72
第一节 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前进	72
第二节 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中日关系进入 “半官半民”交往	90
第三节 中日关系在发展中的障碍	116
第三章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126
第一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背景	126
第二节 中日高层领导人互访及中日邦交正常化 的实现	142
第四章 中日关系的新发展	162
第一节 中日两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	162

第二节	中日关系的新发展	174
第三节	中日两国关系全面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195
第五章	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204
第一节	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204
第二节	中日关系的全面恢复	221
第三节	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及其发展前景	234

附 录

1949 年至 1995 年中日关系演化大事记	258
-------------------------	-----

后 记	333
-----	-----

1	 袁世凯与日本	
2	 袁世凯与日本	
3	 袁世凯与日本	
4	 袁世凯与日本	
5	 袁世凯与日本	
6	 袁世凯与日本	
7	 袁世凯与日本	
8	 袁世凯与日本	
9	 袁世凯与日本	
10	 袁世凯与日本	
11	 袁世凯与日本	
12	 袁世凯与日本	
13	 袁世凯与日本	
14	 袁世凯与日本	
15	 袁世凯与日本	
16	 袁世凯与日本	
17	 袁世凯与日本	
18	 袁世凯与日本	
19	 袁世凯与日本	
20	 袁世凯与日本	
21	 袁世凯与日本	
22	 袁世凯与日本	
23	 袁世凯与日本	
24	 袁世凯与日本	
25	 袁世凯与日本	
26	 袁世凯与日本	
27	 袁世凯与日本	
28	 袁世凯与日本	
29	 袁世凯与日本	
30	 袁世凯与日本	
31	 袁世凯与日本	
32	 袁世凯与日本	
33	 袁世凯与日本	
34	 袁世凯与日本	
35	 袁世凯与日本	
36	 袁世凯与日本	
37	 袁世凯与日本	
38	 袁世凯与日本	
39	 袁世凯与日本	
40	 袁世凯与日本	
41	 袁世凯与日本	
42	 袁世凯与日本	
43	 袁世凯与日本	
44	 袁世凯与日本	
45	 袁世凯与日本	
46	 袁世凯与日本	
47	 袁世凯与日本	
48	 袁世凯与日本	
49	 袁世凯与日本	
50	 袁世凯与日本	
51	 袁世凯与日本	
52	 袁世凯与日本	
53	 袁世凯与日本	
54	 袁世凯与日本	
55	 袁世凯与日本	
56	 袁世凯与日本	
57	 袁世凯与日本	
58	 袁世凯与日本	
59	 袁世凯与日本	
60	 袁世凯与日本	
61	 袁世凯与日本	
62	 袁世凯与日本	
63	 袁世凯与日本	
64	 袁世凯与日本	
65	 袁世凯与日本	
66	 袁世凯与日本	
67	 袁世凯与日本	
68	 袁世凯与日本	
69	 袁世凯与日本	
70	 袁世凯与日本	
71	 袁世凯与日本	
72	 袁世凯与日本	
73	 袁世凯与日本	
74	 袁世凯与日本	
75	 袁世凯与日本	
76	 袁世凯与日本	
77	 袁世凯与日本	
78	 袁世凯与日本	
79	 袁世凯与日本	
80	 袁世凯与日本	
81	 袁世凯与日本	
82	 袁世凯与日本	
83	 袁世凯与日本	
84	 袁世凯与日本	
85	 袁世凯与日本	
86	 袁世凯与日本	
87	 袁世凯与日本	
88	 袁世凯与日本	
89	 袁世凯与日本	
90	 袁世凯与日本	
91	 袁世凯与日本	
92	 袁世凯与日本	
93	 袁世凯与日本	
94	 袁世凯与日本	
95	 袁世凯与日本	
96	 袁世凯与日本	
97	 袁世凯与日本	
98	 袁世凯与日本	
99	 袁世凯与日本	
100	 袁世凯与日本	

绪 论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具有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然而，进入近代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彻底失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中日两国关系有了一个新的变化。由于中日两国人民都渴望两国之间能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尤其是两国政府能够审时度势、不断地调整相互间的政策，使两国之间的关系由对抗逐步转化为友好往来。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不仅直接关系到两国自身的发展、繁荣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幸福，而且，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巩固、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和进一步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是当今人们关注的重要课题，而且，许多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们所以要撰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参与对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

一、本书的研究对象

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既包含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外交关系，也还包含国家之间的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亦应如此理解。在通常情况下政府是国家的代表，因此，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政府之间的往来体现的。而且，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与外交关系，是在国家之间的多方面关系占主导地位的两个关系，它决定着国家之间的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关系的状况与性质。1949年之后的中日两国的社会根本制度、意识形态都存在

本质上的差别。一个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一个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因此，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外交关系，必然要制约着其他方面的关系。这个问题已得到近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关系演化史实的充分证明：当中日两国政府之间政治与外交关系不正常、不友好的时候，两国其他方面的关系就会步履蹒跚、处境艰难；当中日两国政府之间建立起正常、友好的政治与外交关系时，两国其他方面的关系就能比较好地顺利向前发展。基于这个事实，本书将把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政治、外交政策及其关系的发展变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对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中日两国之间诸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基本特征。

中日两国关系除了体现在两个政府之间的往来之外，还体现在两国人民群众、团体、党派之间的联系与往来。这种非政府之间的、以人民群众、团体、党派名义进行的民间往来，在中日两国尚未恢复正常邦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是两国交往的主要渠道。中日两国的民间往来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开展起来的，其主要内容是两国民间的经贸活动。随着民间经贸活动的发展、扩大，又签订了著名的《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贸易备忘录》，后来双方又互设了贸易代表机构：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在中国设立“高碕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贸易备忘录》，在形式上虽然仍是一个民间贸易协定，但是，实际上它是在中日两国政府支持下达成的协议。而且，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两人实际上都是本国政府的代表。所以说这时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已经有了半官方的性质和内容。

此间，日本的一些有较大影响政党的成员，以各种名义组成代表团，进行访华活动，其目的是为了给两国政府传递意见，从而使中日两国非政府之间的民间往来增添了政治方面的性质

和内容。

中日两国之间正常关系的重建与中日两国的民间友好往来紧密相关，因此，1949年之后的中日民间交往的由来、发展、作用，是本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对象。

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直接受到两国各自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尤其受到两国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影响。就中国方面而言，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开拓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与在这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相比，其对外政策包括对日本国的各项政策，就有许多新的特点。就日本国方面而言，由于它在战后国际政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得其外交活动基本上是以“经济外交”为主，但是，由于政府首脑人物的更迭及其对美、对华的态度变化，使其外交活动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变化和特点。诸如吉田茂首相、岸信介首相、田中角荣首相等，他们对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有明显的区别，从而导致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局面的出现。因此，中日两国执政党及其首脑人物，对两国关系的决策与影响，必然成为本书侧重研究的再一个对象。

从1945年8月下旬开始，由美国派其军队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达7年之久。此间，日本的一切外交活动，须按美国占领军总部的指令行事。这时美国推行的全球战略及其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必然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最深刻的影响。中日关系不仅受美国对日、对华政策的影响，还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诸如：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对峙及东西方之间的冷战；60—70年代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80年代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多极化等等，都曾使发展中的中日关系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为了全面

地找到中日关系演化的规律并科学地预测其发展前景，中日关系中包含着的美国等方面的国际关系，本书也要进行系统的研究。

二、1949年以来中日关系演化的基本线索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至今的近50年时间里的中日关系，是在极为艰难的基础上起步的，中间也历经多次坎坷、曲折与磨难。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好的，以“积累渐进”方式扩大交往，由关系不正常逐步转化正常，并进入全面友好发展时期。从两国关系发展总的趋势上看，近50年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五个时期。

1949—1972年为第一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两国政府无正式外交关系，民间往来是两国交往的主要渠道，是两国积累渐进交往的开始阶段。第一阶段又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即：（1）1949—1958年的“民间外交”时期；（2）1958—1972年的“半官半民”交往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日两国不能迅速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主要是由于美国的称霸全球战略和反华政策及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造成的。

日本帝国主义从19世纪末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侵略战争，横行了半个世纪，给上述地区的人民和日本人民造成空前严重的灾难。日本投降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盟国和遭受日本侵略战争灾害的各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强烈要求对战后日本实施《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永远铲除日本军国主义，使日本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根据1945年12月《苏英美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设立远东委员会及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的决议》精神，由中、苏、美、英、法等11国组成的盟国远东委员会决定战后对日基本政

策有如下两个目标：一是“全部解除军备、改组经济，以剥夺日本作战力量，消灭军国主义势力”，“严格取缔一切表现军国主义与侵略精神的制度”，“保证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使日本“非军事化”。二是“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尽速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的政府”，“同各国保持永久的和平关系”，“鼓励日本人民发展个人自由与尊重基本人权的愿望，尤其是信仰、集会、结社、言论与新闻的自由，并鼓励其组织民主与代表民主的机构”，使日本“民主化”。按照盟国的决定，日本在战后进行了民主改革，并取得了若干成效。如果照此正常发展下去，日本政府同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重视中日关系的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当时国际协议规定的原则，完全有可能迅速恢复正常关系的。然而，由于美国推行称霸全球战略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仇视，篡改了国际关于处置战后日本问题的有关协议，改变了战后日本正确发展的方向。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确定了战后要肩负“领导国际社会的责任”的称霸世界的计划。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中的德、日、意被战败，英、法受了重伤。美国不仅因本土远离战场未遭破坏，而且利用战争大发横财，经济、军事力量都得以迅速膨胀，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军事实力的高峰。

美国在战争期间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军事物资，推动了本国工业的发展，到1945年其工业产值为1937—1939年的191%，国外投资比10年前增长124%，黄金储备比1938年增加137%，占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59%，达到208亿美元，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在军事力量方面，1945年美国武装部队总人数为1200万，比1939年的33.5万人增加近35倍；拥有战舰1265艘，而在1940年时只有383艘。此外，美国是

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美国凭借它在战争中间增强起来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在战争结束后便迫不及待地推行其称霸全球的计划。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成为欧亚的军事大国，国际威望大为增强。因此，美国把苏联看作它称霸全球的主要障碍，把所谓“苏联的威胁”视为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美国看来，在亚洲与苏抗衡、“遏制”苏联的最好办法是扶植一个既听命于美国又能稳定亚洲局势的亲美政权。美国政府认为中国能担负起这个使命。就当时中国的各派政治势力和政治派别而言，中国共产党一直被美国看成是苏联在亚洲的代理人及其扩张的工具；而蒋介石集团在战后世界政治问题上，能明确地表示支持美国，因此，美国政府认为：“目前在亚洲唯一能够抵制苏联扩张的就是中国国民党政府”^①，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美国在华取得了领土、领海、领空、铁路交通、内河航运、海关、商业等多方面的特权。美国政府已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后台和“太上皇”，国民党统治区实际上成了美国独占的殖民地。

然而，美国的计划并没有如愿以偿。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到1948年底，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已成定局，蒋介石政府的覆灭指日可待。美国遂调整了它在亚洲的战略，把扶植蒋介石政府的政策改变为扶植日本政府的政策，使日本能为它称霸全球、成为它在远东的反共基地，从1948年起逐步篡改了盟国远东委员会关于对日本的政策。1948年1月，美国陆

^① 美国国务院文件：《美国对华政策》第838页。

军部长罗亚尔宣称：“最初企图使日本广泛地非军事化的旧方针与要把日本建设成为自立国家的新方针之间产生了矛盾”，今后“对日本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我们不仅要使日本能够自立，还必须把它培养成为坚强而安定的民主主义国家，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有权继续参加盟国远东委员会处理战后日本问题的一切事宜。但是，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在外交上拒不承认新中国，在军事上发动了针对新中国的侵朝战争，并派兵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岛，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禁运和封锁。同时，它加速了扶植日本使其成为“反共战略基地”的步伐，它积极帮助日本发展军火工业，特别是它背叛1945年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确定的美、苏、英、中四国一致的原则对日进行全面媾和的方针。于1951年9月，在旧金山召开由它一手操纵的对日媾和会议，把中国这个作为日本侵略的最大的受害者和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国家排斥在会议之外。这表明美国把战后的日本拖进了与中国处于公开敌对的位置。

美国把持召开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以及与此同时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随后又签订的关于实施安全保障条约的日美行政协定，使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在实际上都被美国控制了。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为日本设计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与美国结盟；站在“自由主义国家”一边；以“经济外交”为主，采取与美国、西欧等“自由主义国家”协调政策，振兴贸易；反对共产主义，但不反对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国家关系和贸易关系。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同签署这个条约的48个国家和地区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日本被允许

参加国际组织和从事外交活动。1952年4月，日本政府与被中国人民唾弃的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表明日本政府对新中国采取敌对的立场。这样，恢复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道路，被美、日的反华政策严重地堵塞了。

中国人民推翻反动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1949年10月10日，日本人民成立了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筹备会，反映了日本人民迫切要求与中国人民友好并早日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在两国政府重建邦交无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从经济贸易交往入手实行民间先行的原则。1952年6月、1953年10月，在北京分别签订第一次、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民间贸易。1953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达成协助日侨回国的协议，使3万多名在华日本人陆续返回日本。与此同时，在日本友好团体的协助下使在日本牺牲的中国人的骨灰运回中国。这些既有经济方面内容又有政治方面内容的民间接触，实际上是由民间出面进行的有关两国之间当时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交涉，表明两国交往的开始。

1953年之后，一方面由于新中国社会改革运动的深入以及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声望明显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签订、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国际紧张局势有了一定的缓和，为中日两国进一步扩大交往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中国政府方面为推动中日交往的发展，多次发表讲话、文章，论述中日关系，阐明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外交政策。1954年底鸠山一郎内阁执政以后，对新中国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为改善中日关系也作了许多的努力。这一时期的中日交往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势头。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人员交往的扩大。1952年到1954年底，日本总共有5

个代表团访华，而1955年日本访华代表团达到9个，人数达800人，其中包括前首相片山哲。1954年中国访问日本的只有10人，1955年增加到112人，1956年达142人。中国访日人员中，多数是政府人员以民间团体代表身份出访，其中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等。

(2) 经济贸易有新的发展。签订了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和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渔业协定。1955年10月，在东京首次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约有70万人前去参观。1956年10月，在北京举办日本商品展览会，约有125万人与会参观。

(3) 文化、科学技术交流日益频繁。1955年11月《中日文化交流协定》在北京签字，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代表团、以梅兰芳为团长的中国京剧团访日；安培能成氏率领的日本学术代表团、市川猿之助率领的歌舞伎剧团访华。这个时期，日本还成立了以片山哲为会长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成为推动中日文化交流的团体。

然而，由于国际风云的变化，使中日民间交往也一度逆转。在1957年前后，美国在国际上掀起反共、反华的浪潮，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1957年2月，以岸信介内阁执政为标志，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日关系的行动。这年5月，岸信介政府无中生有地要求中国政府调查所谓下落不明的日本人；6月，岸信介在台湾访问时发表谈话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翌年2月，日本政府把在北海道深山中发现的、在日本侵华期间被劫持到日本当劳工、不堪虐待逃入深山的中国人刘连仁称为是“非法居留”嫌疑犯；4月，岸信介内阁的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发表谈话，不承认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有悬挂国旗的权利；5月，在长崎发生了日本暴徒扯毁中国国旗的事件。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进行了回击，召回了正在日本访问的代表团。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往来一度中断。

日本岸信介内阁恶化刚刚起步的中日关系，不仅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使日本的对华贸易遭到损失，理所当然地要受到两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58年6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发表谈话谴责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的同时，提出了缓和矛盾，解决中日之间存在问题的政治三原则，即：岸信介政府：（1）必须停止继续敌视中国的政策；（2）不参加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中国政府还针对岸信介的政治上敌视中国、经济上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张，提出了“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割”的原则，指出“中日关系必须从政治问题着手，必须经过政府途径解决。”中国政府的这些主张受到日本各界的广泛赞同。1959年3月，以浅沼稻次郎委员长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联合声明，完全同意中国方面提出的政治三原则。9月，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在与周恩来总理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也表示同意“政治和经济不能分割”的原则。从中国政府提出政治三原则及日本各界的响应，使中日的民间交往实际上进入了有官方介入的一个新的时期。

1960年6月，日本岸信介首相辞职，池田内阁成立。从根本上说池田政府的外交政策仍然坚持以日美关系为主轴，对华政策仍然主张政治与经济分离，即在政治上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在经济上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是，由于受到日本国内政局变化、中国政府执行正确的对日政策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加上池田勇人本人从他自身工作经历中，较好认识了中国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未来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池田上台后部分地调整了日本对华政策。他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在坚持以经贸为主的同时，也默许进行一些具有政治色彩的交流。在经贸方面，池田内阁在坚持采取民间贸易的同时，又采取委托民间人士出面与中国沟通、政府在背后支持